

叙利亚：用权利分享，取代该区域的烽烟四起

作者：Stephan Rosiny

2013年8月21日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郊区，发生了毒气袭击事件，据估计，1400人死亡。这样，在叙利亚起义爆发了30个月以后，在起义升级为血腥内战两年以后，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考虑是否直接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。

解析

在叙利亚，地方、区域、国际行动力量及其利益，汇结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，外界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军事行动，有可能会对这一复杂网络造成影响，带来长期改变。这不仅难以解决争端，甚至可能会锐化矛盾。

- 即使叙利亚的起义，已延续到了第三年，但仍无迹象显示可以找到解决方案。在这场毁灭性的权力争战中，无论是政府，还是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力量，看来都无力取得胜利。许多迹象显示，这场战争最后（几乎）只有失败者。
- 众多外界行动力量卷入到叙利亚争端中，它们为叙利亚政府或者不同的反对派阵营提供经济、外交以及军事支持。这样，最初的平民起义，演变成了内战，而内战又演变成了“代理人战争”。“阿拉伯之春”爆发后，叙利亚现已成为中东建立新秩序之战的主要战场。
- 代替军事干预的另一方案就是，向参与的各方施加政治压力，让他们采取非军事的手段处理争端，比如说，发展出一个以谈判为基础的权力分享协议。
- 2013年10月14日，叙利亚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，这为进一步寻求谈判解决方案带来了机遇：Baschar al-Asad领导下的叙利亚政府，以前处于孤立状态，加入这一公约后，他所领导的政府重返国际谈判舞台。现在，区域、国际行动力量，必须敦促叙利亚政府以及反对派，进行严肃谈判。鉴于双方都提出了大量的先决条件，要想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框架下实现这一点，目前估计希望渺茫。

关键词： 叙利亚、美国、内战、代理人战争、第二次日内瓦会议、阿拉伯之春

“阿拉伯之春”背景下的叙利亚

2013年11月初，人们估计叙利亚死亡人数已达到120000人，其中40000人为平民。两百万名难民逃往黎巴嫩、约旦、土耳其、埃及和伊拉克这些邻国，其中青少年儿童人数超过一百万。此外，在叙利亚国内流动的难民人数，亦超过四百万。叙利亚全国人口二千二百五十万，也就是说全国人口中，几乎三分之一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。一百二十万处住房被摧毁。¹ 叙利亚战争，何以达到了如此惊人的暴力及破坏程度？国际军事行动，可能带来哪些影响，谈到终结战争，又有哪些可能性？

自2010年12月起，“阿拉伯之春”给中东已有的专制统治秩序带来了动荡，人们应在“阿拉伯之春”的背景下，理解叙利亚的起义。2011年1月，突尼斯国家元首倒台，一个月以后，埃及总统步其后尘，巴林、也门、利比亚也出现了大型抗议活动，要求推翻专制统治者，当时，统治政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个接一个地被推翻。但开始的时候，叙利亚还是个特例：2011年2月4日，人们在社交网站Facebook和Twitter上发起“愤怒日”行动，虽然这行动获得了12000个“likes”（赞），但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一样，直至2011年初，叙利亚尚未出现过值得一提的示威活动。

对此可以找到两个相互矛盾的解释：一方面可以解释为——同其他的阿拉伯专制君主相比，叙利亚总统Baschar al-Asad人气相当高，其原因是他立场鲜明地表示反对美国在中东推行的、不受欢迎的政策，并反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。叙利亚与伊朗、黎巴嫩真主党，还有巴勒斯坦直至2011年的哈马斯，都是“反抗轴心”（Axis of Resistance）的一分子，直至2010年，这些国家或组织的首脑，在中东还深受爱戴。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为——Baschar总统的父亲Hafiz al-Asad，于1982年2月极其残酷地镇压了哈马市的一场武装起义，自那以后，想举行抗议活动，人们需要克服很高的心理障碍。

2011年3月中旬，叙利亚第一次出现了较大的抗议集会。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，政府对此采取的反应，是大规模的镇压，但是就同突尼斯、埃及、也门、利比亚以前一样，其结果是事与愿违：镇压活

动不停地创造出新的“殉难烈士”，这些“殉难烈士”的葬礼，又成为新一轮抗议活动和镇压活动的触因。镇压活动让人民与政府离心，将越来越多的人推到起义者阵营中去：在青少年（在叙利亚甚至有儿童）进行抗议活动之后，青少年的父母、大家庭、邻居、村庄及城区的居民，也都参加到抗议活动中来。

长时间里，抗议活动仅限于偏僻地区，如德拉地区，还有霍姆斯市、哈马市之类的城市（参见：Leenders 2012）。叙利亚的反对派，严重分裂为不同意识形态、政治方向的团体，分裂为种族及教派团体，它们在方法、盟友、目标方面，都有着极大的不同。唯一能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的纽带，就是它们都要求推翻Baschar al-Asad总统。与此相应，对现行政府倒台以后的未来，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想，从自由民主、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规划，到建立伊斯兰教统治的各种方案（其激进程度不一），直至分裂计划，这些设想区别很大。

不过一如既往，Asad总统仍可以依赖社会与国家机器里重要组成部分的支持。与突尼斯、埃及不一样，军队及安全力量站在叙利亚统治者一边，即使尤其自2011年中期起，军人变节现象常常发生。“阿拉伯社会主义”复兴党思想的坚定追随者，以及“反抗轴心”的坚定拥护者都认为，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起义活动分裂叙利亚社会，并试图以此消除该区域对“美国锡安主义活动”的抵抗。例如，逊尼派的中产阶级的部分成员是叙利亚政府的得益者，他们担心丧失其特权；这些特权，是叙利亚国家干预经济对其忠诚的奖励。而宗教及种族中少数民族的成员，则尤其害怕起义者获胜后极端伊斯兰教派的势力会获得增长，害怕阿拉伯逊尼派沙文主义会得到壮大。

教派化以及区域化

叙利亚社会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种族及教派多样性。除了占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（60–65%）之外，叙利亚还有什叶派阿拉维人（12%）、不同基督教派的信徒（10%）、库尔德人（10–15%）、德鲁兹派（3%）、十二伊玛目派（2%）、伊斯玛仪派、雅兹迪族群，此外还有许多其它小的种族及教派群体。在国家机关和安

¹ 当前难民数目参见：<<http://data.unhcr.org/syrianrefugees/regional.php>>。

全部门，阿拉维派的成员所占比例过高，而参加起义的主要人士是逊尼派阿拉伯人。这加深了将特定教派的人士恶意视为敌人的偏见，并作为矛盾典型模式，影响到这一区域。叙利亚和黎巴嫩、约旦、伊拉克、巴勒斯坦、埃及、土耳其以及海湾王朝，在种族及教派方面、亲属血缘关系上、政治上都有着密切的关联，还通过劳工移民以及难民流动而密切联系到一起。种族及教派团体的成员、部落成员以及伊斯兰教精神领袖的追随者，为“他们”持同一信仰的兄弟输送金钱、武器、战斗人员，通过这些方式，他们跨越国界提供支援。反过来，叙利亚发生的事情，也会影响到邻国，在这些邻国里，逊尼派和什叶派、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、伊斯兰教徒和世俗人士之间存在着对立，这些对立形成的政治极化，部分在叙利亚也能找到相同的情形。

这一发展的一大决定性因素就在于，居民主要将自己认同为他们所处的“命运共同体”的一分子，这种共同体通常是种族共同体、亲属关系共同体或者教派共同体，抑或是具有排外性的政治意识形态，例如种族民族主义、伊斯兰教，与之相反，他们明显不太将自己认同为同一个国家民族的一分子。他们组成强大的、亚国界以及跨国界的“我们之团体”。这些团体在危机时期为自己的成员提供身份认同和保护，而将外界的批评和攻击看作是有威胁性的，甚至常常声称是生死存亡的威胁。社会主义、民族主义、伊斯兰教的不同意识形态流派的追随者，甚至也常常相互视对方为天生的仇敌，要求获得严格的独家代理权。

这种身份共同体在中东意义重大，其原因是国家与社会的发展，相对而言并不发达，缺乏正规结构，而这种正规结构应让居民无论具有何种出生背景、宗教信仰，都能享有平等的国家公民身份，并被纳入到可靠的法规及机构体系中来。现代国家应具有各种功能，如安全、司法、争端调解、教育、社会服务或者市场调节功能，许多中东国家的政府只初步具有这些功能。与其说国家安全部门是保障人民安全的，不如说它们更是要控制人民，司法权是政府当局的权利，对许多居民而言，可望而不可及。国家提供的慈善帮助，取决于慈善接收对象是否循规蹈矩。政治及经济精英群体，仅由少数家庭组成。

人们获得机会、资源、信息的途径，与其说是通过国家机构、公众性民间社会

组织、批评性媒体，不如说更多的是通过自己所处的“我们之团体”的封闭性网络而获得。部落、家族、宗教共同体，还有统治政党（例如叙利亚复兴党），各自作为集体而登台亮相，追逐权力，各自制造并宣告自己的“真理”。这里，国家是他们争夺的“猎物”，而不是社会内部竞争的调节因素。在叙利亚起义中，这类结构明显展露出来，促使起义暴力升级。因此，叙利亚的内战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会成为新的区域危机的预兆。2013年7月初，埃及政府倒台，其后带来了暴力后果，利比亚以及突尼斯的国家构建进程脆弱易折，巴林暴动仍在延续，黎巴嫩以及伊拉克面临内战危机，该地区许多其它的国家，如阿尔及利亚、土耳其出现了内政危机，这些都是新的区域危机的苗头。

“阿拉伯之春”的进程，反映了这一情形的矛盾性：一方面，大多数人对专制政府统治下不公平的、腐败的、毫无尊严的资源、机会获取途径，感到失望且愤怒。“面包、自由、尊严”，曾是抗议者们所使用的关键口号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将这类结构性问题的原因，归咎于统治者个人的失败，看作是他们自己所处的共同体受到的集体歧视，或者视为其它信仰方向的道德沦丧。一旦糟糕的统治者失势倒台，自己所处的团体能获得更多的特权，“真理”学说能上台，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处境能立刻得到改善。埃及目前的发展则显示，这会让人很快感到失望，并再次导致政府倒台。

由和平抗议，演变为内战以及代理人战争

人们针对叙利亚总统Baschar al-Asad所领导的政府进行抗议活动，除了少数特例外，最初半年基本上都是和平进行的。然而，叙利亚政府一开始就对平民过度使用暴力，期望将局限在部分地区的抗议活动扼杀于萌芽状态，并对其它地区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。2011年夏，安全部门的一些下属人员拒绝执行开枪的命令，变节脱离军队，这样，抗议活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。变节的军人与其它的志愿者一起组成了“叙利亚自由军”（FSA），开始了武装反抗活动。尽管政府加大镇压力度，出动了坦克、大炮、战斗机、火箭，最近甚至动用了化学武器，政府也越来越难以扑灭叙利亚四处爆发的武装起义。有作战经

验的外国民兵，尤其是激进的伊斯兰教圣战分子，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权力的转移，2012年初起这些圣战分子攻击叙利亚政府，为这次起义逐渐渲染上宗教色彩（参见：ICG 2012）。据估计，激进的伊斯兰教圣战分子的战斗人员数目，达到六千到一万五千人，而他们自己甚至声称人数高达三万人（参见：The Daily Beast 2013）。他们来自中东不同的国家，来自土耳其、阿富汗，来自高加索地区，来自东南亚，近十分之一的人来自欧洲（600到1000名男子）。对他们而言，叙利亚现在是他们全球“圣战”的中心，他们在此对抗“非伊斯兰教的”政府，对抗“变节的什叶派人”，对抗“西方”，只要有人、有事物反对他们所持的意识狭隘的、好战极端的伊斯兰教设想，基本上就都会成为他们对抗的对象。

自2012年中期起，反对派的民间雇佣兵之间发生的战斗，日益增多，特别是在部分叙利亚自由军、圣战分子和库尔德民间雇佣兵之间。叙利亚分崩瓦解，变成零散的块块碎片，各种武力分子、军阀控制自己的领土，并建立起类似国家的秩序。据估计，2013年中期，叙利亚存在着1200个武装团体。他们能很快招募到新成员，但是如果其它的团体更高效、装备更好、薪水更高，招募的人员就会流失到其他团体中去。例如，叙利亚自由军中“温和”反抗军队里的战斗人员，就部分流失到圣战网络组织（例如与基地组织结盟的努斯拉战线）中去。自从库尔德人的一些队伍2013年夏在东北地区要求自治以后，他们就受到了叙利亚自由军及努斯拉战线中的一些队伍的袭击。“魔鬼”民间雇佣军（也就是沙比哈[Schabiha]），主要由阿拉维人（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）组成，叙利亚政府让他们从事对抗起义的肮脏工作，这样，叙利亚政府也助长了教化派发展。

该冲突早已符合内战的标准。众多外国行动力量参与进来，这样，这场冲突益发扩大为代理人战争：

- 伊朗、沙特阿拉伯、卡塔尔、土耳其之间争夺区域霸权；
- 逊尼派以及什叶派争夺教派统治优势；
- 逊尼派阵营内，土耳其、沙特阿拉伯、卡塔尔、前总统Mursi领导下的埃及，争夺“逊尼派”领导者这一角色；

- 以色列以及伊朗争夺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生存权，并且围绕伊朗核计划展开争斗；
- 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不同流派争夺宗教阐释权；
- 阿拉伯人、库尔德人、土耳其人、波斯人争夺文化方面的优先权或者特权；
- 世界两大强国——美国以及俄罗斯，还有英国与法国争夺区域及全球影响力。

在叙利亚，这些行动力量为了能在“阿拉伯之春”以后在中东建立起基本新秩序而你争我斗。叙利亚政府得到俄国、中国、伊朗、非国家性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。而积极站在反抗军一方的，则有土耳其、沙特阿拉伯、卡塔尔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约旦、利比亚，以及前总统Mursi倒台之前的埃及。此外，外国私人赞助者，以及逊尼派、库尔德派、什叶派的政党，也向叙利亚的不同政治阵营提供武器及民兵雇佣军。一些地方据猜测是国家的军事设施，以色列对这些地方多次发动空袭，并多次对通往黎巴嫩的武器运输队进行空袭，通过这种方式，以色列直接干预战争。

反过来，这些争端越来越跨越国界，影响到邻国：叙利亚的难民带来了他们伤痛经历以及自己对事件的见解。他们在难民接收国加强了政治对立，并激化了种族与宗教的仇恨心理。外国的战士带着清晰的政治及宗教敌对偏见和游击作战经验，回到自己的国家，这让当地的政治对立军事化。在黎巴嫩和伊拉克，宗族及教派共同体成员相互对峙，这些共同体在叙利亚也能找到类似的存在。黎巴嫩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，早就发生了炸弹袭击以及武装战斗，这些都与叙利亚内战相关联。

无论是政府，还是起义者，都致力于用武力方式赢得这场冲突的胜利。双方现在都足够强大，无法被战胜，但又太过弱小，无法自己赢得胜利。一方的强大，招致另一方获得盟友的帮助，扩充军备。一方战胜另一方，这种“以胜利来终结”的解决方式，会导致该区域种族及教派进一步加剧分极化：占多数的逊尼派起义者获得胜利，会刺激逊尼派成员争取在其他国家（例如伊拉克以及黎巴嫩）改变力量对比关系。与此相反，“什叶派及阿拉维派”的政府获得胜利，会加大这一区域内的反什叶派仇恨情绪。

使用化学武器成为转折点

如果2013年8月21日，人们在大马士革郊区未曾大规模使用毒气，那么，这场内战以及代理人战争可能会毫无衰减地持续下去。对美国总统Barack Obama而言，大规模使用毒气，这已经跨越了“红线”，多个西方国家元首表示他们要坚决对叙利亚政府进行军事袭击。军事袭击之所以泡汤，估计可能是因为出现了一个言语上的“无心之失”：2013年9月9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，美国国务卿John Kerry回答一个记者提问时，表示只有叙利亚将所有的化学武器都交给国际社会的情况下，才会取消军事袭击。但他当时自己都没料想到叙利亚会接受这一解决方案。估计是俄国向叙利亚施加压力，于是叙利亚外长Walid al-Muallim在同一天就宣布，叙利亚愿意接受这一建议。2013年9月14日，叙利亚宣布愿意加入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，9月21日就按要求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（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, 缩写为OPCW）呈交了一份叙利亚化学武器库及生产基地的名单。联合国安理会2118号决议确认，9月27号联合国宣布要求叙利亚裁减化武军备库存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员于10月开始审查并摧毁化学武器及其生产基地。

一场只有失败者的战争

一场军事惩罚行动，无论当时“动刀”动得如何干净利落，都不能减少平民群众的苦难，反而会延长战争，让化学武器的控制变得更加艰难，对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谈判造成不利影响，促使区域矛盾升级。而人们有时候提出一个解决方案，建议将叙利亚领土划分为各种小的种族国家，以此来保护少数民族，即使这种做法可能不会带来内部种族清洗，即使新的小国可能不会出现长期的边境之争，它也会带来新的少数民族问题。此外，这也会对邻国领土完整带来威胁。叙利亚的起义，加强了现有的库尔德人争取自治的努力活动。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所居住的地区，自称是“西库尔德斯坦”，该地区与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地区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。以他们为榜样，可能会促使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加入库尔德民族统一主义联盟。

战争的延续，甚至起义者的胜利，可能最后都会证明，提供支持的国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萨拉菲主义政治意识上激化，演变为好战的圣战主义，这甚至对沙特阿拉伯以及卡塔尔这样保守的海湾王朝都带来了威胁，而这两个国家数十年来对萨拉菲主义提供支持。其原因是，圣战主义偏见里固执认为的敌方，除了“变节的”什叶派和所谓的西方“十字军骑士”以外，还包括“腐败的”海湾王朝。在叙利亚取得阶段性胜利，会鼓励他们为获得其狭义理解中的“伊斯兰教的胜利”，而在其它国家进行战斗，例如利比亚、突尼斯或者埃及，还有巴林、沙特阿拉伯。

这样，持久的叙利亚战争也为邻国带来了不利影响：种族及教派紧张关系的扩散蔓延，威胁土耳其、伊拉克、黎巴嫩、约旦（参见：ICG 2013）。许多土耳其人对本国政府在叙利亚纠纷中采取的片面立场，感到不满，他们举行反对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（AKP）所领导的政府，发起抗议活动及暴动，这正显示出了他们的不满。其它支持起义的势力，也害怕伊斯兰教得以壮大：2013年6月15号，当时的埃及总统Mursi公开呼吁他的人民，加入反叙利亚政府的圣战，这促使军方决定7月3号发起政变推翻他。

无论叙利亚政府会获得胜利，还是一败涂地，它的外界支持者，特别是俄国和伊朗，也会面临挫折。俄国出于地缘战略利益、军事以及经济利益因素，希望叙利亚政府维持统治：由于Putin是叙利亚总统Asad的亲密朋友，如果叙利亚政府被推翻，那俄国必须考虑到叙利亚的同盟政策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阿富汗于2001年、伊拉克于2003年、利比亚于2011年相继发生军事政变，这一系列的政府倒台事件发生之后，叙利亚也许会成为下一个政府倒台的中东国家，在国家建设重组时，叙利亚可能会将俄国排斥在外，或者让俄国大幅度丧失影响力。此外，对俄国而言，受到威胁的还包括大量武器业务、俄国参与的叙利亚石油及天然气开采项目、俄国驻塔尔图斯港的海军基地，同时叙利亚欠下的高额债务，亦可能无法偿还。但是，俄国对叙利亚的兴趣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。其证据就是，据称沙特王子Bandar bin Sultan向Putin表示，如果Putin减少对叙利亚政府的支持，会向Putin购买价值一百五十亿美金的武器，并保障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运输，但是王子无功而返（参见：Reuters 2013）。如果这类“交

易”成功，无疑会动摇俄国作为政治伙伴的可信性。

1989年俄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惨败，伊斯兰教徒当时将其视为“打败共产主义的胜利”而进行庆祝，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战争，以及伊斯兰教恐怖团体在莫斯科进行的袭击，这都解释了为什么莫斯科害怕，如果叙利亚起义者在内战中获胜，圣战主义会变得强大及得到扩张。不过，对Asad政府提供毫无保留的支持，其结果也可能是事与愿违，因为叙利亚政府如此血腥暴力地打击起义者，只会继续让起义者变得极端起来。圣战分子可能会越来越针对俄国，而不再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。

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动机及其支持底线，则有所不同。除了战略原因外（叙利亚是通向伊朗的伙伴——黎巴嫩与巴勒斯坦的桥头堡），道德因素及宗教因素也颇具意义。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（1980年至1988年），叙利亚是伊朗唯一的阿拉伯伙伴。反过来，伊朗如今在困难时期也要站在伙伴身边。此外，什叶派的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”虽然持“泛伊斯兰主义”的言论，但它认为自己对什叶派肩负保护责任。叙利亚有各种什叶派圣迹，这些圣迹已经成为袭击的目标。激进的逊尼派将什叶派视作背叛了伊斯兰教的“伪神崇拜者”，由此得出结论，他们有权杀死每个什叶派。因此，伊朗训练并装备什叶派的民间雇佣兵，这些雇佣兵在叙利亚帮助政府，并且保护什叶派的圣迹和居住地区。

但是伊朗的努力也面临着事与愿违的危险。自“伊斯兰教革命”爆发之后，伊朗将自己看作是“被剥夺权利的人”的保护者，开始时认为“阿拉伯之春”的各种起义，是伊朗自身革命的延续。然而现在伊朗支持叙利亚对人民起义进行暴力镇压，这动摇了伊朗的革命形象。此外，叙利亚内战中教派矛盾益发尖锐，这对伊朗及其什叶派盟友造成极大损害，因为该区域教派战争中的大多数牺牲者是什叶派成员，他们在叙利亚只是少数民族。黎巴嫩真主党站在叙利亚政府一方，采取军事行动，从而在黎巴嫩声望大降。什叶派的极端分子威胁要进行报复袭击，2013年8月15日，由真主党控制的、属于什叶派的南贝鲁特地区，发生了一场汽车炸弹袭击，造成22人死亡。

权利分享作为替代解决方案

打破叙利亚政府以及反对派、还有他们的支持者之间的僵局，并谋求政治谈判解决方案，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。想让叙利亚总统Asad坐到谈判桌前并作出让步，关键着眼点，落在俄国身上，尤其还要注意伊朗，这两个国家是唯一能向Asad施以必需压力的国家。有迹象显示，美国愿意承认伊朗在寻求可能解决方案方面的重要性。俄国和伊朗须向Asad政府清楚显示，对它们这两个国家而言，也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“红线”，越过这条线，他们将不再准备提供无条件的支持。如上所述，俄国和伊朗对用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争端，持有极大的兴趣。但这两个国家只在顾全自己利益的情况下，才会向叙利亚政府施压。反过来，他们也会要求，起义者的西方及中东伙伴，敦促起义者同意谈判解决方案，而不以Asad放弃权利作为先决条件。此外，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这两个阿拉伯海湾国家，还有土耳其须收回对圣战分子提供的任何帮助，无论是武器、金钱，还是让他们借道过境方面，都应不予提供帮助。

叙利亚各方行动力量以及利益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，其复杂程度可媲美“米卡多游戏棒”这种锻炼灵活度的游戏：如果拨动一根游戏棒时用力过猛，会对其他所有的游戏棒造成严重影响，甚至会让整堆游戏棒倒塌。因此，寻求矛盾解决方案时，必须考虑到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。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。这儿没有什么万灵药，但是这方面的榜样、经验、专家（比如联合国特使Lakhdar Brahimi），对谈判伙伴都能有所助益。面对现在的僵局，叙利亚及外界行动力量可以向邻国黎巴嫩学习，当时，黎巴嫩就是采用“没有胜利者，也没有失败者”的折中方案，结束了十六年的内战（1975-1990）。

同黎巴嫩一样，在种族及教派群体中按比例划分权利，这并不能成为克服不同出身群体之间社会分化的灵丹妙药。这种做法，更可能带来的威胁就是会在中期内加固社会分化现象，让国家成为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关系网络的猎物。因此，这只能作为直接危机调节的手段，让各群体不害怕被排斥、被消灭，保证他们参与政权，对竞争进行政治调解。下一步，则必须建立一体化的国家机构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，这有利于跨教派的合作，

能逐步重建敌对者之间的信任。随着时间发展，应建立起进行职能划分的先进国家，这个国家在权利和义务方面，能一视同仁地对待自己的居民（参见：Rosiny 2013）。

黎巴嫩战争，就如同今天的叙利亚战争一样，当时也有众多的外界行动力量通过代理人，对战争进行干预。1989/1990年，黎巴嫩战争终于结束。当时的大多数行动力量，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行动力量，都意识到，继续战争所带来的危险，会超过渺茫的胜利所带来的利益。面对叙利亚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，人们不得不希望，叙利亚战争中地方的、区域的、全球的行动力量也能尽快意识到这一点。

Rosiny, Stephan (2013), Power Sharing in Syria: Lessons from Lebanon's Taif Experience (叙利亚权力分享：黎巴嫩塔伊夫经验中汲取的教训), in: *Middle East Policy*, 20, 3, 41–55.

The Daily Beast (2013), Syria's Western Jihadists (叙利亚的西方圣战分子), 8月4日, 网址: <www.thedailybeast.com/witw/articles/2013/08/04/western-jihadists-head-to-syria-to-fight.html> (2013年11月1日).

参考文献

ICG 见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
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(2013) *Syria's Metastasising Conflicts* (由叙利亚扩散开的危机), *Middle East Report*, 143, 网址: <www.crisisgroup.org/en/regions/middle-east-north-africa/egypt-syria-lebanon/syria/143-syrias-metastasising-conflicts.aspx> (2013年10月3日).

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(2012), *Tentative Jihad: Syria's Fundamentalist Opposition* (实验性质的圣战者：叙利亚的原教旨主义反对派), *Middle East Report*, 131, 网址: <www.crisisgroup.org/~media/Files/MiddleEastNorthAfrica/IraqSyriaLebanon/Syria/131-tentative-jihad-syrias-fundamentalist-opposition> (2013年9月5日).

Leenders, Reinoud (2012), Collective Action and Mobilization in Dar'a: An Anatomy of the Onset of Syria's Popular Uprising (德拉地区民众的战斗行动及动员：剖析叙利亚爆发的民众起义), in: *Mobilization*, 17, 4, 419–434.

Reuters (2013), Saudi offers Russia deal to scale back Assad support – sources (沙特向俄国提供交易，让俄国相应缩减对Assad的支持来源), 8月7日, 网址: <www.reuters.com/article/2013/08/07/us-syria-crisis-saudi-russia-idUSBRE9760OQ20130807> (2013年11月1日).

■ 作者简介

Stephan Rosiny博士，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东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。他的科研重点包括：伊斯兰教、种族及教派矛盾、东阿拉伯区域的政治体系。他负责主持“中东多种族社会的权利分享”科研项目，该项目获得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资助。

邮件地址：<stephan.rosiny@giga-hamburg.de>，

网址：<www.giga-hamburg.de/en/team/rosiny>

■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，本专题的相关研究

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一号科研重点——“政治体系合法性及效率”中，“非民主性政府的持久性及变化”科研小组，对政治转型进程、选举的意义、政府以及反对派的相互作用进行比较分析。“暴力及安全”二号科研重点中的“战争进程与和平进程”科研小组，对多种族社会的权利分享进行研究。

■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，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

Bank, André 与 Morten Valbjørn (2012), *The New Arab Cold War: Rediscovering the Arab Dimension of Middle East Regional Politics* (新的阿拉伯冷战：中东地缘政治中重新发现阿拉伯的意义维度), in: *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*, 38, 1, 3–24.

Bank, André 与 Eric Mohns (2012), *Syrian Revolt Fallout: End of the Resistance Axis?* (叙利亚叛乱的附带结果：反抗轴心的终结？), in: *Middle East Policy*, 19, 3, 25–35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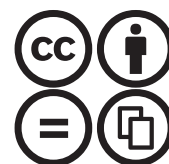
de Juan, Alexander 与 André Bank (2013), *The Effects of Regime Cooptation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Violence: Evidence from the Syrian Civil War* (暴力地缘分布方面政府同化的影响：叙利亚内战中找到的证据), *GIGA Working Papers*, 222, 网址: <www.giga-hamburg.de/en/publications/working-papers>.

Rosiny, Stephan (2012), *The Arab Spring: Triggers, Dynamics and Prospects* (阿拉伯之春：诱因、演变及前景), *GIGA Focus International Edition English*, 1, 网址: <www.giga-hamburg.de/en/publications/giga-focus>.

Rosiny, Stephan (2012), *Konflikt und Machtteilung in fragmentierten Gesellschaften: Syrien, Bahrain, Libanon und Irak im Vergleich* (分化的社会中的矛盾及权利分享：叙利亚、巴林、黎巴嫩、伊拉克之比较), in: *Hessische Stiftung Friedens- und Konfliktforschung (HSFK) (编辑), Friedensgutachten 2012*, Münster: LIT, 249–262.



GIGA《焦点》刊物，为开放式发表刊物。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、下载，链接为 <www.giga-hamburg.de/en/publications/giga-focus>，并可依据“知识共享许可协议”中“姓名标示—禁止改作3.0” 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d/3.0/de/deed.en>的规定，自由复制、传播、展示作品。特别注意：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《焦点》刊物，不得更改、删节。



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– Leibniz-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(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–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) 坐落于汉堡，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、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，就非洲、亚洲、拉丁美洲、中东、全球问题，出版《焦点》系列刊物。编辑组讨论、甄选文章，文章中、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《焦点》刊物国际版。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、出版，非德国外交部刊物。选取的主题、作者所持的观点，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。保留错误、遗漏的可能性。GIGA及其作者，对内容正确性、完整性，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，不承担责任。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、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，仅是为了方便阅读。

编辑：Robert Kappel；杂志系列总负责：Hanspeter Mattes、Stephan Rosiny

翻译：曹娟 (Cao Juan)；审校及排版：Christine Berg (山可婷)

联络：<giga-focus@giga-hamburg.de>；GIGA, Neuer Jungfernstieg 21, 20354 Hamburg, Germany 德国汉堡

出版说明

G I G A Focus
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
Leibniz-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